神秘的契丹文字

□刘凤翥



我国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契丹大字是辽太祖主持创制的。《辽史·太祖本纪下》神册五年（920年）条记载："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契丹小字是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创制的。《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称："（耶律）迭剌……性敏给。太祖曰：'迭剌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接待回鹘使者学习回鹘语言文字与创制契丹小字是两码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契丹小字与回鹘字没有任何关系。谓"契丹小字是回鹘字母拼以契丹语"纯系臆测。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一些，但史书漏记契丹小字创制的具体年代。终辽一代，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等一直通行于辽境。西辽也继续使用契丹文字直至亡国。

辽亡金兴。金朝虽然创制了女真

→ 4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文字，但金朝前半期在使用女真文字和汉字的同时，仍使用两种契丹文字。金代传世的契丹大字资料有大定十六年的《李爱郎君墓志》(以前被误称为《应历碑》)的拓本。金代传世的契丹小字资料有《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萧仲恭墓志》和《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金史·章宗本纪》)。一种文字虽然不会随着一纸诏书的颁布而立即死亡，但随着认识契丹文字的一代人全部死去之后，当时的人又没有收藏意识，遂使契丹文字就渐绝于世，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书籍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契丹文字成了长期不被人们所识的死文字。从明代的赵崡(《石墨镌华》)，清代的王昶(《金石粹编》)、毕沅(《关中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直到近代的郭沫若(《唐乾陵文物保护碑》)，见了陕西省乾县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之后，一律“有眼不识金镶玉”，不仅一字不能识，而且均误断为女真字。至于一般平民百姓，更不知契丹文字为何物，甚至一些研究辽史的专家学者也对契丹文字知之甚少。

现在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都是在失传数百年之后而于20世纪和21世纪陆续出土和被发现的。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在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苏木”，蒙古语音译，义为“乡”)瓦林芒哈(蒙古语音译，义为“瓦砾滩”)地方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出土了契丹小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等文物。凯尔温不谙传拓之术，于是雇用华人以5天的时间逐字抄录之。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手抄本的照片首次发表在法文版《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23年第118期。这是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首见天日，其意义非常重大。1930年，又出土了契丹小字辽道宗和宣懿皇后哀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把辽兴宗、仁懿皇后契丹小字哀册的手抄本照片和辽道宗以及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的拓本照片发表于1933年的《通报》(T’oung Pao)第30卷上，从而在学界引起轰动。海内外的学者竞相研究契丹文字，遂在学界产生一契丹文字专业。

1932至1935年间，罗福成(1884～1960年)、王静如(1903～1990年)和厉鼎煃等人开始研究契丹小字。他们差不多在相同的时期利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获得了大致相同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比较法”而已矣。所谓“比较法”，就是把同一个人的汉字哀册与契丹小字哀册对比，把同一盒契丹小字哀册的册盖与册文对比，把各个契丹小字哀册互相对比，把契丹小字哀册与《郎君行记》进行对比，把每个契丹小字哀册的不同部分进行对比，把契丹小字资料与史书记载的有关历史事实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汉字记录的契丹语进行对比。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复比较，他们终于解读出了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的题目，还比出了于义为“年”、“月”、“日”的字和有限的干支、年号、数目字，释出了“呜呼哀哉”、“诞日”等少量日常用语，其中后经验证释对了的有70个字左右。他们只释出了这些字的字义，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些契丹小字的读音。1932年7月发行的《满洲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罗福成的《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是解读契丹文字的拓荒作。奉天图书馆1934年刊行的金毓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是中国早期研究契丹文字的代表作，该书著录了当时传世的所有契丹小字资料和罗福成考释契丹小字的所有成果，还著录了当时国内外介绍辽庆陵和契丹字哀册的一些文章。金毓黻在绪言中首次提出庆陵式契丹文字是契丹小字的正确见解。王静如当时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有二：一为《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12月第3本第4分；二为《契丹国字再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12月第5本第4分。厉鼎煊《热河契丹国书碑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此期刊物虽然印着1932年12月出版，但此期刊物中的文章有引用1933年他人文章的情况，又据王静如等当时人讲，该刊物当时严重脱期，标明的出版时间与实际时间往往相差一两年之久，所以厉氏此文并不是契丹文字的拓荒之作。仁声印刷所1934年还刊印了厉鼎煊研究契丹文字的单行本《契丹国书略说》。

日本最早关注契丹小字者为羽田亨。早在1925年，他就在《史林》第10卷第1号上发表了《契丹文字的新资料》，通过与契丹小字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对比，最早提出《郎君行记》是契丹文字而非女真文字的正确结论。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山路广明、田村实造、长田夏树、村山七郎、爱宕松男等人也积极参与研究契丹小字。他们并没有重新释读什么契丹小字，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构拟已被中国人释读的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上。每个契丹小字是一个单词，每个契丹小字是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构成的。原字是当代学者给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所起的名字。日本学者构拟契丹原字的音值并没有什么高招，而是把已知字义的契丹小字硬拿蒙古语来念。契丹语和蒙古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有一些单词的发音是一致或相近的，例如“马”、“龙”、“兔”、“蛇”等，凡是这类契丹语词用蒙古语来读往往会有一些收获。然而契丹语并不等同于蒙古语，大部分单词的读音两者并不一致，用上述方法构拟契丹原字音值者拟对者少，拟错者多。后经验证，当时国外学者所构拟的契丹原字音值拟对或接近拟对的约30个。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为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的《庆陵》（1953年座右宝刊行会版）、山路广明的《契丹语の研究》第一辑（1951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7月油印本）和《契丹制字の研究》（1956年油印本）。1963年，苏联发表了沙夫库诺夫、达思今、鲁道夫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其中较有价值者为《东方铭刻学》1963年第15期上发表的沙夫库诺夫《契丹—女真大小字解读问题》，其中对十几个契丹原字音值的构拟值得参考。

20世纪30年代之后直至70年代中期，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在中国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其间虽然也偶尔有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发表，例如《考古学报》1954年第8册上发表的厉鼎煌的《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考古》1973年第5期发表的王静如的《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但仍处在30年代水平，没有质的飞跃。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中期才有转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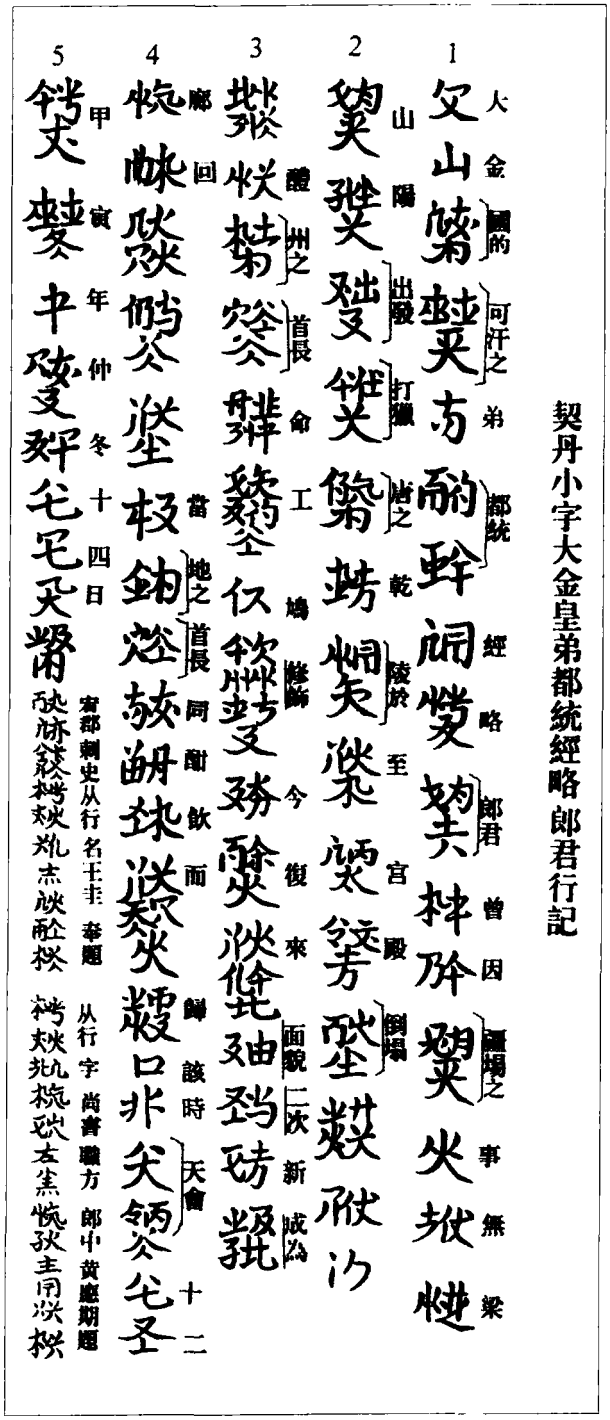
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民族所（民族所于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组成了以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为成员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开启了利用双方优势互补集体研究契丹文字的新纪元，从而在我国掀起了以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研究活动为主导的研究契丹小字的新高潮，至今方兴未艾。

要解读一种死文字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用两种语言写的铭文（双语言铭文）可使解读的条件更为有利……在缺少双语言铭文的情况下，则解读湮没已久的文字非常困难，有时仿佛是不可能的。”（[德]约翰·弗里德里希：《古语文的释读》，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版）在传世的契丹小字资料中，只有《郎君行记》是有汉字对译的。《郎君行记》共11行，前5行是契丹小字，后6行是汉字，最后一行只有“右译前言”四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右面的汉字是翻译的前面语言。研究小组于是从解读《郎君行记》入手，利用寻找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释义与拟音相结合的办法，以已知求未知，逐步解读契丹小字。为了说清楚被遗忘的契丹小字是如何被初步解读的，我们先把汉字《郎君行记》全文抄录如下。

>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向以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回廊四起，不胜欣峄，与醴阳太守酣饮而归。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书职方郎中黄应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题。右译前言。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第5行有一个字。这个字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释出是“皇帝”和“皇太后”等词中的“皇”字。我们首先假定契丹语中的“皇帝”和“皇太后”都是汉语借词，则读huang（为了使广大读者便于阅读此文，本文一般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标注契丹文字的读音，万不得已时才用国际音标。凡用国际音标一律加[]符号）。汉字《郎君行记》后半部分没有“皇”，只有人名“黄应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的“黄”读huang。我们假定《郎君行记》第5行的是音译的“黄”，则字之下的

二字为“应期”。倘若如此，则音ying，音q，音i。汉字《郎君行记》“黄应期”之前是官名“尚书职方郎中”，我们再假定契丹文字中“尚书职方郎中”也是汉语借词。我们在字前截取



六个字，假定它们是汉语借词“尚书职方郎中”，则
为“尚”的音译，音sh，音ang。
为“书”的音译，音sh，音u。为“职”的音译，音zhi。是“方”的音译，是由上下结构的和两个原字拼成，音f，应音ang，后来发现字在第5行出现过，音译人名“王圭”的“王”，从而知道它不读ang，而读wang。
是“郎”的音译，此字在第4行出现了一次，是音译汉语借词“回廊”的“廊”，音l，音ong。
是“中”的音译，音zh，音ong。

我们发现上述的假定有一定的道理。汉字“尚”和“郎”的韵均为ang，契丹小字中均作，互相吻合，并不矛盾。我们根据上述假定的一些原字的读音，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以已知求未知的方法滚雪球式地继续往前推求。

《郎君行记》第2行有，由于一直已知音ang，音l，音ing，假定音t，音qi，音an，则音tang qian ling，可以认为是“唐乾陵”的音译。视为所有格词尾，则为“唐之乾陵”。由于已知音ing，音l，我们可以推知第1行的为汉语借官名“经略”之音译。“经”的中古语音为[kien](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声母为[k]。国际音标的[k]相当于汉语拼音方案的g，原字可拟音为g。“略”在《中原音韵》中属龙声母萧韵，喻世长先生给它拟音为[liau](《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因此，可以给拟音为[iau]，给拟音为u。由于已知音wang，音g，我们推知第5行的为人名“王圭”，从而可以给原字拟音为uei。由于已知音l，音sh，我们可以推知第1行末字和第2行首字合起来为地名“梁山”，从而可以推知原字音yang，音a，音an。

我们还发现契丹小字的拼音规则往往重叠元音。以为例说明如下：(sh)+(a)→sha。sha+(an)→shan(山)。sha与an相拼时两个元音a重叠成一个元音a。

汉字《郎君行记》在“经略”之下是“郎君”。在契丹字《郎君行记》的(经略)之下的字是。我们已知(sh)+(a)→sha。契丹语中“郎君”读“沙里”(《辽史》卷一一六)，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为契丹语的“郎君”，读“沙里”，则可给原字拟音为li。汉字《郎君行记》在“经略郎君”之前是“都统”，在契丹字《郎君行记》的(经略)之前是，则此二字舍“都统”莫属。汉字《郎君行记》在“都统经略”之前是“皇弟”，在契丹字《郎君行记》的(都统经略)之前是，则此二字舍“皇弟”莫属。如前所述，契丹语“皇帝”的“皇”为，读huang，而在此处“皇弟”作，如何解释呢？原来“皇帝”在契丹语中既有汉语借词，又有其本民族的单词“可汗”。契丹语中管“皇帝”叫“可汗”。契丹小字“可汗”作，为所有格词尾。于义为“可汗之弟”即“皇弟”。汉字《郎君行记》在“皇弟”之前是“大金”，在契丹字《郎君行记》的(皇弟)之前是三个字，三个字怎么翻译两个字“大金”呢？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索和其他契丹小字资料的验证，终于弄明白，契丹小字于义为“国”，为所有格词尾，于义为“大金国之”。

契丹字《郎君行记》的第1行的前10个字终于被解读。译为汉字为“大金国之可汗之弟都统经略沙里(郎君)”。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该语系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元音和谐律，即随着词干的元音不同，要求连接同一作用的不同的词尾。因此，为所有格词尾，也是所有格词尾。它们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要与词干的元音和谐。

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是谓语置于宾语之后。例如契丹语 把“僧敲月下门”说成“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敲门”说成“门子打”。汉语“至唐乾陵”，契丹语必然说成“唐乾陵至”。我们既然释出了契丹小字为“唐之乾陵”，在它之后的于义必为“至”。汉语“回廊”，契丹语的语序应为“廊回”，我们已经释出了为“回廊”的“廊”，则应为“回廊”的“回”。

《郎君行记》刻于天会十二年（1134年），当时唐乾陵归醴州管，直至天德三年（1151年）醴州才改称乾州（《金史·地理志下》）。汉字《郎君行记》有“爰命有司，鸠工修饰”和“与醴阳太守酣饮而归”。“有司”就是有关的地方政府，也就是醴州的长官。前面已经构拟出音l，音i，《郎君行记》第3行的音li，可以假定它是音译的“醴州”的“醴”，则字之下的应为附有所有格词尾的“州”字的音译。于义为“醴州之”。前面已经给原字拟音为sh，“州”的声母为zh，二者似乎有矛盾，但经过周密研究，才知道契丹语中zh、ch、sh区分得并不严密。我们可以给原字拟音为ou，为所有格词尾无论是用在“唐乾陵”的“唐”字上还是用在“大金国”的“国”字上，抑或用在“醴州”的“州”字上都合适。解读对了就一通百通。字之下的应为“长官”之义。契丹字《郎君行记》用“醴州之首长”来翻译汉字《郎君行记》的“有司”。由于契丹语谓语置于宾语之后，“爰命有司”的“命”必然置于之后。契丹字《郎君行记》第4行还有一个字，它也应为“首长”之义，这个“首长”应当是翻译的“醴阳太守”的“太守”。在之前是，并不见音译“醴”的字，我们把假定为“当地的首长”即“醴阳太守”。

《郎君行记》的纪年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辈学者就已经比对出来了。就这样，先从人名“黄应期”入手，逐步滚雪球式地不断往前推进，终于使《郎君行记》的大部分契丹小字被解读。

我们再以取得的这些成果做基础去对其他契丹小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以已知求未知。例如已知为“书”的音译，音ing，音sh，音i，音ong。音ou，是“中”的音译，是“经”的音译，音ling。则为汉语借词“尚书令”的音译，为汉语借词“中书令”的音译，为汉语借词官名“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音译。这样又可以推测出原字的音值为m，原字的音值为en，原字的音值为xia，原字的音值为p，原字的音值为zh，原字的音值为shi。

就是这样不断以已知求未知滚雪球式地循序渐进，不断解读新的汉语借词，不断构拟新原字的音值。在解读了一定数量的汉语借词的基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础上，再逐步解读契丹语固有的单词，例如于义为“马”，读[muri]。于义为“冬”，读[uli]。于义为“名”、“讳”、“号”等，读[iri]，等等。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从1975年成立，至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6开本800页的专著《契丹小字研究》，真可谓十年磨一剑。专著共释读了400多条语词，构拟了140多个原字的音值，并刊布了当时传世的所有契丹小字资料。

《契丹小字研究》出版之后的20多年以来，又出土了20多件契丹小字墓志铭，由刘凤翥主持，已经将这些新资料陆续发表在《民族语文》、《文史》、《燕京学报》、《国学研究》以及台北的《史学汇刊》等刊物上。

比起契丹小字来，契丹大字的资料出土较晚，也比较少，由于它拼音程度较低，解读起来比较难，因而研究起步较晚。

首先涉及契丹大字资料的文章是1935年10月出版的《满蒙》第16年第10号上发表的山下泰藏的《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该碑两面分别刻有契丹大字和汉字。该文虽刊有碑刻两面的拓本照片，但均欠清晰。

1939年9月27日的沈阳《盛京时报》和长春的《大同报》均刊有稻叶君山的谈话，谈话揭示了契丹大字《故太师铭石记》出现在古董商店的信息。1942年4月出版的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期上发表了李文信（1903～1982年）的《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此文虽然题目中称《故太师铭石记》为契丹小字，但在正文中则称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文中刊布了契丹大字《故太师铭石记》的拓本照片，局部照片使人清楚认识了契丹大字的真面目。此文还运用与女真字对比的方法解读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年”字。此为解读契丹大字之始。

刘谦在《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首先报道了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于1951年夏在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的情况。《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发表了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该文利用与汉字墓志对比的方法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大安”、“重熙”和“统和”等年号，“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廿三马年五月”、“木龙年”等纪年。

阎万章文章的后面附有编者金毓黻先生安排的金光平、曾毅公的《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摘要。关于何为契丹大小字的问题，摘要的见解与阎万章不同。摘要主张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西孤山出土的《萧孝忠墓志》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金光平又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上发表了《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从与女真字对比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萧孝忠墓志》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的理由。刘凤翥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上发表了《契丹大字和契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小字的区别》，论证了两种契丹文字何者字多，何者字少；何者繁，何者简；何者进步，何者落后，从而得出结论：西孤山出土的《萧孝忠墓志》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此文观点被国内外同行所认同，并被学界一致采用。

日本研究契丹大字者，严格说来只有丰田五郎一人而已。他于1963年6月在《东洋学报》第46卷第1号上发表了《契丹隶字考》，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元年冬”、“鸡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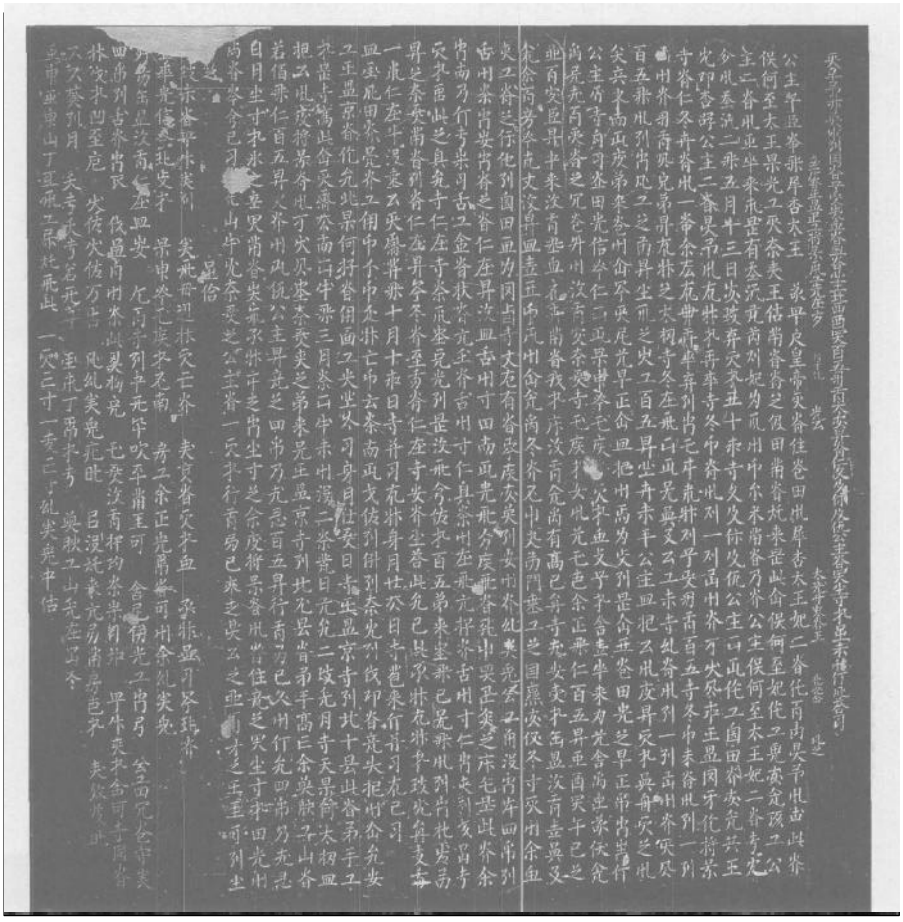
刘凤翥在《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纟乙”的读音》，文中利用新出土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论定了“纟乙”字原为参照汉字“幼”、“幺”创制而成的契丹大字，后来混入汉字之中，其读音也近于汉字“幼”或“幺”。同时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蛇”。刘凤翥又在《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该文释出了契丹大字“正月”和年号“大康”以及个位数字“四”和“八”。刘凤翥与马俊山在《文物》1983年第9期上发表了《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中释出了契丹大字“圣宗皇帝”、“铭曰”、“西南”、“天山之东北”等语词。该文还提出“契丹大字中除了不拼音的音节字之外，也存在拼音字”，正确指明契丹大字也有拼音性质，这对此后契丹大字的解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凤翥和于宝麟在《文物》1984年第5期上发表了《“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文中释出了契丹大字“金吾大将军”、“小将军”等词。《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阎万章的《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文中释出了契丹大字“六”、“九”和“守太子太傅”等语词。《考古》1991年第4期上发表了金永田的《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文中释出了契丹大字“道宗”、“天庆”、“留守”、“于越”等语词。

刘凤翥对契丹大字《萧袍鲁墓志铭》和《耶律习涅墓志》等新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写出了《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文章从解读契丹大字“岁”入手，从而考释出契丹大字“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等一系列十位数字与个位数字“七”和年号“乾统”等语词，并再次论证了契丹大字有拼音性质。1991年5月15日，中日联合首届契丹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京都开幕，刘凤翥于当日下午在大会上宣读了上述论文，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此文修改后发表于台北《汉学研究》1993年第11卷第1期。香港中文大学的阮廷焯（1936～1993年）博士也参加了京都会议，会后他写了《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刊入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年刊行的《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该文对契丹大字“嘉鹿山”、“撰”的解读，令人首肯。丰田五郎也参加了京都会议，他于会后写了《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用以参加1993年8月在赤峰市召开的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刊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文解读了契丹大字“西平郡王”、“王家奴郎君”、“习尼里郎君”、“太师”、“太保”、“使相”、“子”等语词，还构拟了一些契丹大字的音值。

刘凤翥在《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即该杂志创刊100期专号上发表了《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此文通过与女真字对比，从而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州”字，进而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云内州”、“静江州”、“松山州”、“归州”、“乾宁州”等地名和“辟离剌”等人名以及“金紫崇禄大夫”、“观察使”、“衙内”等官名，还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祖父”、“父”、“夫人”、“太夫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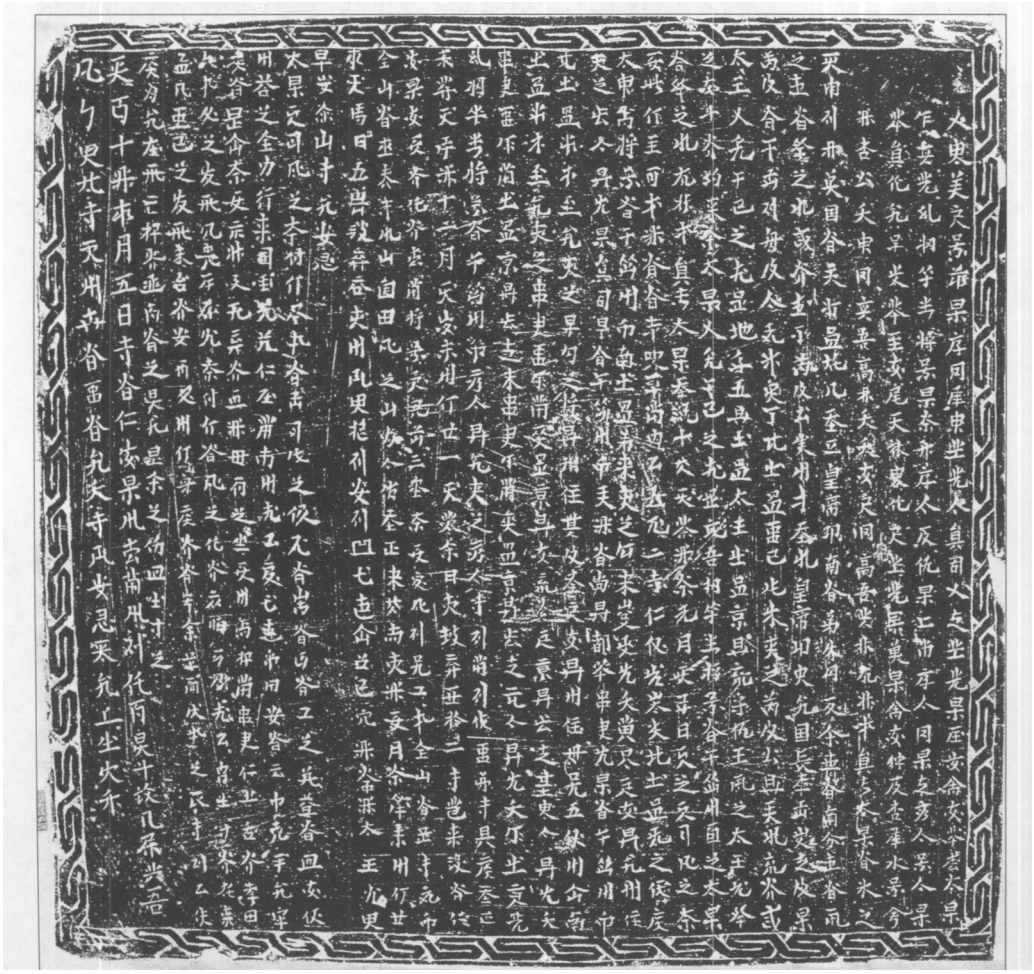


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拓片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及“封”、“号”等语词，并释出了与 I 类元音词干相和谐的所有格词尾，还为一些契丹大字构拟了音值，并进一步讨论了契丹大字基本上为音节拼音文字的性质。此文的发表标志着契丹大字的解读已经进入到释义与拟音相结合的新阶段。正因为如此，此文获得民族研究所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成果二等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 年新第 7 期发表了刘凤翥的《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文章最大的贡献是把当时传世的所有契丹大字的墓志及相关的汉字墓志全部摹写发表，并对每件契丹大字墓志作了力所能及的释文。日本文字文化研究所 1998 年刊行的《日中联合文字文化研讨会发表论文集》发表了刘凤翥的《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综述》，文章最大的贡献是把当时已经解读的契丹大字语词汇总



→ 14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分类发表。

2000年2月，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了汉字萧兴言墓志和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萧兴言和永宁郡公主是夫妻，汉字萧兴言墓志为解读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提供了一些线索。《燕京学报》2003年新第14期发表了刘凤翥、唐彩兰的《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此文考释出契丹大字中的“大中央哈喇契丹国”、“兄弟之仲父房”、“孟父房”、“族系的”、“故”、“北西路招讨”、“妻”、“永宁郡公主”、“墓志铭”、“并序”、“于上京以北三十里”、“慈家奴”、“撰”、“写”、“太原”、“齐国大王”、“景宗”、“三韩大王妃”、“二人之女”、“于辰时生”、“成为”、“申猴”、“戌狗”、“亥猪”、“卯兔”、“丈夫”等词语或词组。“哈喇”是音译，现在看来应当意译为“辽”。“兄弟之”是直译，应当把它意译为“横帐之”。



契丹大字银币

2000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和汉字兰陵郡夫人墓志。耶律昌允和兰陵郡夫人是夫妻。2004年的《燕京学报》新第17期上发表了刘凤翥、王云龙的《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之研究》。由于作者熟悉辽代职官，利用兰陵郡夫人汉字墓志提供的耶律昌允的职事官的线索，再利用职事官与散官和阶、勋、爵、封邑以及宪衔的配套关系，一举把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的前四行全部解读了出来：“建雄军节度使，晋、慈、隰、汾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左千牛卫上将军、使持节晋州诸军事、晋州刺史，知涿州军州事，兼管内巡检、安抚、屯田、权农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国、漆水县开国公，食邑七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五十户耶律观音太师之墓志”。还释出了“皇帝之同胞之弟”、“第三子孩邻”、“政事令”、“令公之长子留隐·海里”、“五院”、“黄龙府之事”、“都监”、“兴中府”、“中京”、“东京之同知”、“佛山”、“丹国（东丹国号）”、“敕葬使大理卿大公鼎、敕祭发引使太常少卿”等词语或词组。文章还附有音值构拟表，为190多个契丹大字构拟了音值。

（题图：契丹小字《韩高十墓志》拓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